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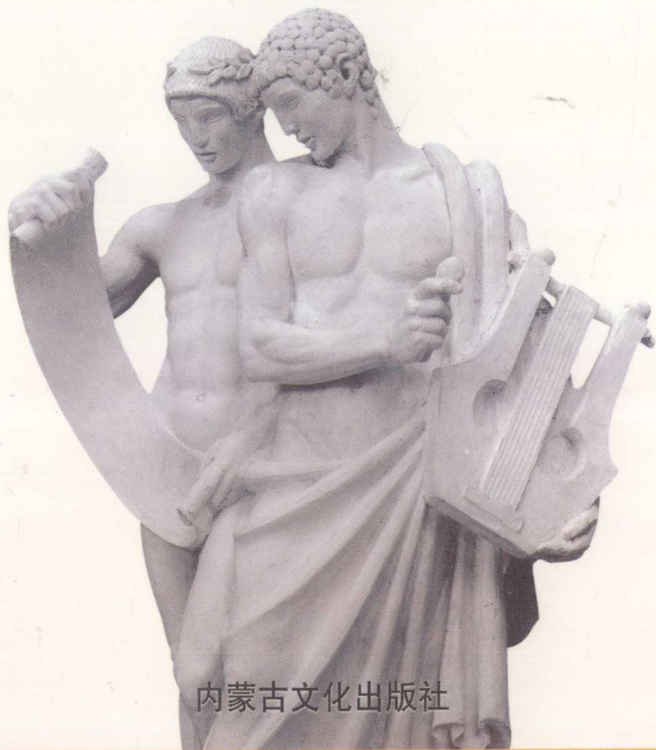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短篇小说选



黄色箭头

[俄] 维·佩列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 短 篇 小 说 选

黄色箭头

[俄] 维·佩列文

王海涛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力吉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0 字数：2100千字

2002年4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06-913-1/I·364

定价：416.00元

目 录

黄色箭头	〔俄〕维·佩列文	(1)
阿来克西或徒劳斗争的独白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45)
神圣的贫困尤西	〔芬兰〕弗·西兰帕	(95)

黄色箭头

〔俄〕 维·佩列文

王海涛 译

吵醒安德烈的是那司空见惯的、清晨的喧闹——挤满过道排队洗漱的人们精神十足的谈话声、薄薄的隔板那边小孩肆无忌惮的哭声和身旁的鼾声。他本想在这即将来临的一天的清晨再睡上一会儿，但广播突然响了起来。音乐演奏开来——它好像是从某个公用大饭锅里被倾倒入播音室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不见的播音员就在脑袋上方说道，“您将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开始新的早晨。但愿您的今天轻松、愉快、充满阳光——这便是著名的爱沙尼亚歌唱家古娜·塔马斯对您的祝福。”

安德烈伸着两条腿在地板上够鞋穿。躺在旁边铺位上的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还在打呼噜，他屁股上搭着的被单盖着一个蓝色三角戳，从他后背和屁股均匀的起伏来看，他还准备在梦乡里再酣睡一个小时。显然，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对古娜·塔马斯的清晨问候和过道里的声音均无动于衷，但他的那身空气铠甲也帮不了别人的忙，对于安德烈来说，新的一天不可抗拒地开始了。

已经穿好衣服的他喝了半杯冷茶，从挂钩上摘下那条绣了两只双头公鸡的毛巾，拿上盥洗用品，来到过道。洗漱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人，是蓄着大胡子、名叫阿维里的山民——他的大圆脸上莫名其妙地没了往常的温厚，就连从手里露出来的牙刷把儿，也仿佛是一把匕首。

“我排在你后面，”安德烈说，“我先去抽根烟，行吗？”

“没事。”阿维里阴沉地回答。

当刻有“火车头队——冠军”字样、其上有扇痰迹斑斑的小窗的

门咔哒一声在安德烈身后关上时，他忽然想起，昨天他的烟就被抽光了。好在门后就坐着一个摆摊设赌的，他周围站着几个人。安德烈向其中的一个要了一根道路牌香烟，站在了一边。

摆摊的人老得干干巴巴，简直就像一只垂死的猴子，那只接受施舍的空啤酒罐，比他在纸板上慢慢地挪来挪去的三只棕色塑料杯挣的钱还多。不过，他可能是头儿或是师傅——他的伙计们长相严肃，体格健壮。伙计共有两个，穿着一样的浅褐色皮夹克，那是政治犯缝制的，皮子极其糟糕；他俩假装吵了起来，互相推搡着对方的胸口，轮流从师傅手里赢得面值五千的新票子，师傅默默无语地把钱递给他们，连眼睛都不抬一下。

安德烈走到旁边，靠在车窗旁。广播预报得对——这一天是个真正的晴天。斜射的黄色光线时而照在设赌人抬起来的秃顶上，他头上一缕缕灰白色的头发，突然间犹如光环在闪烁，他在一张纸板上的骗术，也突然变得像某种被遗忘的宗教仪式那样神圣起来。

“哎，”一个伙计抬起头说，“你冒什么烟？这儿的空气本来就已经被污染了。”

安德烈没吭声。他心里想你可以给报纸写信，就说：兄弟姐妹们，我说，我们这里的空气被污染了。

“你聋了？”那个伙计站直腰又说了一遍。安德烈仍没说话。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伙计都不对——这地盘是别人的啊。

“转啊，翻啊，我要赢大钱。”摆摊人突然哑着嗓子说了一句。

显然，这是一个暗号——那伙计全明白了，他梗了梗脖子，又迅速回到刚刚中断的与伙伴的争吵中。安德烈最后一次伸了个懒腰，把烟头扔到他们的脚底下。

队刚好快排到，阿维里已不明去向，安德烈前面只剩下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出乎意料，前面的人洗得很快。

安德烈随手关上门，打开水龙头，看了看镜子里自己的脸，他想，近五年间，这张脸与其说是成熟了或是衰老了，还不如说是失去了存在，就像喇叭裤、先验默想和“弗利特沃德·麦克”乐队一样。最近流行的完全是另外一些面孔，具有战前三十年代的特征，从那中

间可以得到许多走得很远的结论。安德烈一边胡思乱想着这些结论，一边刷完牙，迅速洗好脸，又回到了自己的包厢。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已经从睡梦中醒来，他坐在茶几旁，边挠痒痒边翻阅过期的《道路报》，这份报纸是安德烈昨天用一罐啤酒跟一个茨冈人换来的，但他还没空出时间来读。

“早上好，安德烈！”彼得·谢尔盖耶维奇用手戳着报纸，说道，“这里写道：有证据证明雪人是存在的。”

“早上好，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安德烈说，“那全是荒诞不经的话。您昨天又打了一宿呼噜。”

“瞎说。真的吗？”

“真的。”

“你吹没吹口哨？”

“吹了，吹了，”安德烈说，“还有什么办法呢？只不过没用。您只要平躺着，就马上开始打呼噜，之后什么办法都不好使。您最好把自己捆上，好一直侧身躺着。记不记得您去年是怎么弄的了？”

“记得，”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我那时可比现在年轻。现在我这么弄就睡不着。哎，倒霉。这都是我神经上的问题。要知道以前，安德烈，在这些操蛋的改革之前，我从来没打过呼噜。不过没什么，我们想点儿办法。”

“报上还写了些什么？”安德烈用脑袋点着报纸问。应该在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开始回忆改革之前赶紧改变话题。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一边用手指头在泛绿的报纸上划来划去，骂着一成不变的脏话，一边开始转述社论，而安德烈点着头，提着问题，开始设想自己这一天的计划。首先得吃早饭，然后应该去汗那里，有件不太好说的事要找他。

狭长的餐车里摆着十多张不舒适的小桌子，这儿还没见什么人，但已经开始飘出一股糊味儿，而且好像还是什么不新鲜的东西烧糊了。安德烈坐在窗户旁自己常坐的座位上，背朝着收款台，在阳光下

眯缝起眼睛看菜单。上面只有大麦粥、茶和“阿塞拜疆白兰地”。安德烈迎着服务员的目光，并用力地点了点头。服务员用手指作了一个手势，标示出一个大约一百克的刻度，并询问地向他笑了笑。安德烈用摇头来表示反对。

热乎乎的阳光照在布满黏糊糊油渍和碎屑的桌布上，安德烈突然想到，对于那霞光万道的阳光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它们在太阳的表层开始自己的行程，跨越空旷无垠的宇宙，穿过厚厚的云层，最终仅仅是为了在昨天喝剩的令人恶心的汤碗里消失。要知道，完全可以让这些从窗外斜射进来的黄色箭头拥有意识、美好的愿望和对这种无根基愿望的理解——也就是说，像人一样，拥有一切使自己喜怒哀乐的必要元素。

“也许，别人也会觉得，我就如一支落在桌布上的黄色箭头。而我穿越而过的脏玻璃就是生活。现在我坠落，坠落，鬼知道我将用几年的时间坠落到桌上的盘子前面，而那时，有个人正坐在那儿看菜单，等着早餐……”

安德烈抬眼看角落里的电视，一张非常熟悉的脸映在眼前，还有一个在三只褐色麦克风前无声大张着的嘴。之后，镜头切转到另外两个人，他们恶狠狠地挤在另一个麦克风前，用俄国的弗洛伊德方式毫无廉耻地相互撕扯着一模一样的红褐色领带。

服务员走过来，把早饭放到桌上。安德烈看了看铝碗。那里面是大麦粥，还有一块化了的奶油，像一个小小的太阳。安德烈一点儿食欲都没有，但他提醒自己，下顿饭至少也要等到晚上了，于是，他便开始顽强地往下咽热粥。

第一批顾客出现了，餐车里开始洋溢着人们说话的声音——安德烈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寂静实际上没被破坏，只不过在寂静之外，又多了些引人注意的刺激物。寂静就像他碗里的大麦粥——浓浓的，黏黏的；寂静扭曲了人的声音，在寂静的映衬下，人的声音听上去断断续续、歇斯底里。邻桌的人在大声谈论雪人，说昨天好像有个疯老太太看见了雪人。安德烈先听了一会儿谈话，之后就没再继续听了。

一个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男人坐到他的对面，那人穿一件规矩

的黑制服，翻领上别着一个银十字架。

“祝您胃口好。”他微笑着说。

“您别开玩笑。”安德烈说。

“您怎么这么不高兴？”邻座惊讶地问道。

“那您怎么这么开心？”

“我不是开心，我是愉快。”邻座回答道。

“我也一样，”安德烈说，“我不是忧郁，而是有事情要想，我坐在这儿思考。”

喝完粥，他把茶杯挪到自己跟前，开始搅动茶里的糖。邻座继续微笑。安德烈寻思，他现在又要说话了，于是便把勺子搅得更快些了。

“思考，偶尔还要沉思，”邻座作了一个指挥动作后说道，“当然，这是有益的，也常常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但一切都取决于，这么说吧，这个过程是从哪儿开始的。”

“怎么，”安德烈问，“还有不同的源头？”“您是在讽刺，然而千真万确有它们的存在。有时，人想尝试自己去解决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解决了。可这个人却还被蒙在鼓里。或者，他还不明白，这就是他那个问题。”

安德烈把茶喝完了。

“也有可能，”他说，“那的确不是他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只不过由于我们的自负和愚昧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人，甚至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只要他孤身一人，就总是软弱的。他需要支持，需要一种东西使他的存在变得合理。他需要在他所做的一切之中看到最高度和谐的闪光，在他每天于周围所看到的東西之中。”

他用手点了点车窗。安德烈顺手望去，看见一片树林，树林后面远远的地平线上，不知是哪个电站还是工厂的三座锈成褐色的大烟囱直插云霄，它们如此粗壮，就像三只巨大的杯子。安德烈笑了起来。

“您怎么啦？”邻座问。

“您知道吗，”安德烈说，“我想象一个拉手风琴的大块头醉汉，

个子有天那么高，思维呆滞，脚步不稳。他用这把手风琴伴奏，唱着一支粗俗的歌，已经唱了很久很久了。手风琴油渍斑斑，闪着亮光。后来，下面的人却发现，这就叫做最高度和谐的闪光。”

邻座的眉头微微皱了皱。

“这一切，您知道吗，都是很平常的事，”他说。“造化的等级，不完善的丑恶世界，如此等等，如果历史能引起您的兴趣的话。一句话，诺斯替教它反正永远不会使您幸福，明白吗？”

“您说的是呀，”安德烈说，“多可怕的一个词。那什么能使我幸福呢？”

“通向幸福的路只有一条，”邻座用叉子在碗里拌了拌，沉重地说，“就是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找到意义和美，并服从于伟大的意图。只有在这之后，生活才真正开始。”

安德烈本想问问，到底谁的意图才是应该服从的，应该服从众多意图中的哪一个意图，但又觉得，对方肯定会硬塞给他一个小册子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没吭声。

“也许，您是对的，”安德烈从桌后站起身来，说道，“谢谢您的谈话。对不起，我的心情打早上起就不好。我看得出来，您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我的工作就如此。”邻桌说，“谢谢您。这个您拿着做个纪念。”

邻桌递给安德烈一个彩色小册子，封皮上画着一只走了样的粉扑扑的耳朵，一个金属音符正往里飞，音符上有两只大约十二口径宽的翅膀，亮光闪闪，看来是带着最高度和谐的闪光。安德烈道过谢，把小册子装进口袋，往出口走去。

不用赶时间，但他还是走得飞快，不时碰着总是于此时在狭窄的过道里踱步的许多人，并因此而道着歉。那些人看着窗外，微笑着，斑驳的阳光在他们的脸上颤动。不知为什么，穿着土耳其产的运动服、年纪还轻就已经发福的妇女特别多——他们身边围着一群沉默寡言的孩子，孩子们正忙着杂乱地研究周遭的世界。有时，随便穿着汗衫的丈夫们也会出现在她们的身边，很多丈夫的手里都拿着啤酒。

安德烈觉得，新的一天已将他投入运转，并强迫他思考许多他厌

烦已极的事。但没办法——周围的人声和噪音长驱直入他的脑袋，并开始在里面滚动，就像彩票转盘里的小球，并时而会变成他自己的思绪。开始，隐蔽的广播里传出来地狱般的歌谣，它盖住了一切声音，之后，就无可避免地想到音乐过后人们就会提起的那个纳杰日塔，之后，就开始播天气预报，安德烈斜眼瞟着身边闪过一个个车窗，窗外的南风可能会刮得更猛烈些。他几次绕过人群，他们猫腰站在另一个照例会有的设赌者摆下的流动祭坛前——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所有摆摊人和他们的伙计相貌都十分相似，说话时的南方口音也如出一辙，似乎这是一个特殊化的群体，他们从小就开始研习这门艺术，学习怎么把塑料小球藏在大拇指的脏指甲里，怎么在纸板上移动三个倒扣的杯子。又过了几分钟，安德烈终于停在了一扇黄色塑料门前，门上 是罗马数字“XV”，还有一道划痕，形似一支尾巴冲下的箭头。

只有汗一个人在，——他坐在茶几旁，小口喝着茶，望着窗外。和平常一样，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运动服，上面有一行字：“加利福尼亚天使”，这行字总能引起安德烈对加利福尼亚天使的轻微怀疑。安德烈还发现，汗很久没刮胡子了，有点儿像惯常装束的三船敏郎——他的半蒙古血统的眼睛也有些吊眼梢儿，这就使他更像三船敏郎了。

“你好。”安德烈说。

“你好。把门关上。”

“如果和你一个包厢的人回来怎么办？”

“他们回不来。”汗说。

安德烈关上门，镀镍门锁啪的一声锁上了。他脑中闪现出一个不祥的预兆——拉枪栓的声音随着落锁声在脑中一闪而过。过了一会儿，他为自己的恐惧感到有些可笑。

“坐吧。”汗用脑袋点一下对面的铺位。

安德烈坐下了。

“有什么新鲜事？”汗问。

“一般，”安德烈说，“没什么。你想过吗，最近这五年里你都做过些什么？”

“为什么是五年呢？”

“多少年并不重要，”安德烈说，“我说‘五’，是因为五年前的我和现在一个样。也这样到处乱走，乱看，想的也是同样的东西。如果再过五年，还是一样，你明白吗？……你干吗这么怪怪地看着我？”

“哎，醒醒！”汗说。

“我好像挺清醒。”

汗摇了摇头。

“马上回答我，黄色箭头是什么？”他问道。

安德烈惊讶地抬起眼睛。

“真奇怪，”安德烈说，“黄色箭头这一概念我今天在餐车里也想到过。确切地说，想的不是黄色箭头，而是随心所欲地想想罢了。思考生活。知道吗，那儿的桌布很脏，光线照在上面。我想到……”

“喂，站起来。”

“干吗？”

“站起来，站起来。”汗重复着，从小茶几后站了起来。

安德烈刚起身站稳，汗就极为不礼貌地抓住他的领子，摇了几下。

“想想，”他说，“你为什么来了这儿？”

“把手拿开，”安德烈说，“你发什么傻？我就这么来的。”

“我们在哪儿？你现在听见了什么？”

安德烈把汗的手从自己的夹克上扯下来，疑惑不解地皱了皱眉头，他顿时醒悟了，他听见了钢和钢有节奏重复的碰撞声，这声音之前一直响着，但他却没有意识到。

“黄色箭头是什么？”汗又问了一遍，“我们在哪儿？”

他将安德烈扭到车窗前，安德烈的眼前出现了窗外从左向右飞驰而过的树冠。

“怎么样？”

“等等，”安德烈说，“等等。”

他两手抱头坐在床铺上。

“我想起来了，”他说，“开往断桥的火车就是黄色箭头。就是我们乘坐的这列火车。”

“你现在还记得你过去的事吗？”汗问。

“记不清了，”安德烈说，“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好像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我叫什么名字，我知道；我在哪个包厢，我也知道。但那好像完全不是我。我感觉特别奇怪——坐在哪节车厢里似乎是不一样的。假如餐车里的桌布是干净的，那么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就会具有更多的含义。或者，假如电视里播放的是另外一些嘴脸，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你明白吗？”

“你可以不解释，”汗说，“你只不过暂时当了乘客。”

安德烈从窗口转过身来，看了看车厢连廊的墙壁，那是一个操作台，上面装着的两个仪表盘灰蒙蒙的，还写着一行字：“逐一检查……”（后面是空白）

“我现在是乘客，”他说，“你也是。”

“一个正常的乘客，”汗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乘客。因此，一旦你意识到你是乘客，你就已不再是乘客了。他们从未想到过可以离开这列火车。对于他们，火车就是一切。”

“对于我们也一样，除了火车什么都不存在，”安德烈阴沉地说，“当然，如果我们不是自欺欺人的话。”

汗冷笑了一声。

“不是欺骗自我，”他慢慢地重复着，“如果我们不欺骗自我，别人马上就会来欺骗我们。而且，一般说来，善于欺骗你所说的‘自我’，是一项非常大的成就，因为一般都是反过来的——是自我在欺骗我们。除了我们的火车，其他的东​​西存不存在，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够活下去，就当这其他的东​​西都存在。就好像当真能下火车一样，这就是全部的区别。但你要想把这个区别讲给哪个旅客听，他还未必能理解呢。”

“你怎么，试过了？”安德烈问。

“试过。他们甚至不明白，他们是在火车上。”

“有点儿像胡言乱语，”安德烈说，“旅客们居然不明白，他们是

在火车上。有人听得进你的话就好了。”

“可他们确实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怎么能理解那些他们本来就熟知的东西呢？他们甚至连车轮的撞击声都置若罔闻了。”

“是啊，”安德烈说，“是这样。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当我走进餐车时，心里还想，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多么安静。”

“就是，非常安静。就连茶勺碰杯子的声音都能听见。记住，当一个人不再能听见车轮的撞击声却仍然同意往前行驶时，他就变成了一位旅客。”

“谁也没问我们同不同意。”安德烈说，“我们甚至连怎么来的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就是固执地行驶，这就是一切。什么都留不下。”

“生活中最复杂的东西被留下了。坐在车上，但不成为它的旅客。”汗说。

一个乘务员打开连廊的门走了进来。安德烈认出他是餐车里的邻桌，只不过他现在戴着大檐帽，缝着领章的制服紧紧箍在他凸出的肚皮上，领章上闪着银光的东西，不知是两个交叉的小斧头，还是两把小钥匙，他罩在黑制服衬衫外面的红色毛背心时隐时现。他心不在焉地甩着一串钥匙，那标志着他的职位，钥匙是镀镍的小圆柱，手柄做成十字架形，和喝醉的乘客打交道时，乘务员把它当成铁指套来用，有时也用它开瓶子。乘务员也认出了安德烈，他咧嘴笑了笑，用三个并拢的手指敬了个礼。

乘务员闪身进了车厢后，汗问：“他干吗龇牙咧嘴的？”

“就这样。吃饭时我们谈过话。要是再来一次怎么办？”

“什么？”汗问，“你说乘务员吗？”

“不是。我是说如果我再次变成旅客怎么办？”

“不让自己变不就得了。我们大家有时都可以这样做。”

“什么叫我们大家？难道我们这里有许多人？”

“我想，是的。”汗说。“应该有很多人，只不过都是素昧平生。以前的确有很多。”

“你说，你第一次是从谁那儿知道这些的？”

“不知道。”汗说，“我没看见过他们。”

“怎么回事？你怎么能从你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打听到什么呢？”

“就这么回事。”汗说。安德烈明白，汗不想再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他问。

“我想，在那儿。”汗一边说，一边冲窗外点了点头，窗外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一阵阵风掠过草丛，就像是在水面上拂过。

“他们死了吗？”

“他们下车了。有一天深夜火车停了，他们打开门就下了车。”

“我看，你好像搞错了，”安德烈说，“黄色箭头号列车在任何一站都不停车，这是众所周知的。”

“听着，”汗说，“清醒点儿。乘客从来不知道他们乘坐的火车叫什么名字。他们连自己是乘客都不知道，他们还能知道什么呢？”

安德烈一开门就看出来，他的车厢里有些异常。几个穿黑衣服的人站在一间包厢的门口；一个戴黑头巾的中年妇女在哭。广播没响，但从一阵哀沉的音乐从阿维里的房间传出：这是一台小录音机放出来的。安德烈进了自己的包厢。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彼得·谢尔盖耶维奇。

“索斯金死了，”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推开书，说道，“现在是葬礼。”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半夜。阿维里那儿要安排一个新人进去。”

“我说他怎么这么不高兴呢？”安德烈说着，一边看了一眼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读的书。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早班车上》。

“是啊，是这么回事儿。”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他的事没办成。他本想把他哥哥调过来。你也知道，黑毛在一个地方落脚后，总想把自己所有的人都折腾过来。列车长看了看证件，说道，他哥哥本来就坐在软卧车厢，硬座和卧铺车厢里排号的人还有很多。虽然我觉

得车长不太可能会把谁从卧铺车厢里安排过来。就因为阿维里塞得少了，或者是塞错人了。——所以才这样调理他。”

安德烈想起烟还没买。

“什么书？”他问。

“没什么，”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写生活的。”

他又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安德烈走进过道。人们正从包厢里往外抬尸体，越过哀悼者不太礼貌，所以他靠在了车窗边。不过，送葬的过程一般都很短暂。

从敞着的门后露出来的死人的脸十分苍白，两个乘务员用纤维板抬着他。这种纤维板是专门用来做这项工作的，两面都涂上了红油漆，四周还描了黑花边，它更像一面送葬用的小旗，所以，让人莫名其妙的是，为什么民间把它叫做停尸板。

死人身上从脖子以下盖着一条深红色的旧毛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阿维里，正手脚并用地开窗户，却怎么也弄不开，两个男人过来帮忙。他们一起把窗框往下拉，开了一个四十厘米左右的口子。戴黑头巾的妇女马上大叫起来，于是，她被架到包厢里去了。列车员谨慎小心地抬起停尸板，把它的一头送出窗外，开始把死人往外推。——他们的动作很慢，以免毛手毛脚的动作伤害了在场的人。有一下索斯金差点儿被卡住——毯子都堆到了胸口上了。

透过安德烈跟前的窗户，能看见死者的头和他迎风乱飞的头发，他的脑袋悬在离路基三米高的地方，冲着天空的眼睛微微张开，高高的天上悬着蓝色的云朵。那颗脑袋离开车厢的黄色板壁时，抖了几下，然后飘然地落了下去。随后，红毯子的一角在车窗外一闪而过，只听得下面砰的一声。再过了一秒钟，枕头和毛巾也飘出窗外——遵循传统，在扔掉死人之后也要扔掉他的枕头和毛巾。

可以去买烟了，但安德烈还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窗外。几秒钟过去了，视野里绿色的山坡突然消失不见了，车轮和铁轨撞击的声音变大了，窗外掠过生锈的桥梁钢架，桥下是一条不知名的、又长又深的河。

餐车里放着音乐，还是那盘结尾录了半音《烦恼河上的桥》的永恒的磁带。安德烈看见他的老朋友格利沙·斯特鲁宾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格利沙穿着一件时髦的花呢夹克，翻领上还别着交通部的著名标志，这个东西价值连城，但格利沙有钱。共产党还在台上时，他就在火车上倒卖香烟、啤酒，现在发展的范围就更广了。格利沙对面坐着一个头发剃得很短的外国人，正就着鱼子酱喝盛在小铝碗里的燕麦粥。格利沙看见安德烈，招手让他过去，一分钟后，安德烈已经挤进了他们旁边的空座。格利沙最近又胖了，变得更开心，头发也更鬻曲了。——也许，这不过是别人的错觉，因为他已经有点儿喝多了。

“你好，”他说，“介绍一下。这是安德烈，和我一同度过苦难童年的朋友。这是伊万，我成年后的同志，生意伙伴。”

安德烈明白了，小伙子是个侨民。他们沉默无言地握了握手。安德烈回头看看四周有没有熟人。没找到，但周围和平日里的晚上一样，很多芬兰人和阿拉伯人都醉醺醺的。

“我们喝两口？”格利沙问。安德烈点点头，格利沙倒了三大杯“铁路特酿”。

“为我们的生意干杯。”伊万举杯说。

“对，”格利沙说完冲安德烈挤挤眼睛，“什么叫生意，你猜得出来吗？”

“能猜个大概。”安德烈边说边和他们碰碰杯，“根据发音就能猜出来。无非就是‘生义’，‘生疑’，‘生异’。总之，最近很多花样百出的词钻进我的耳朵。生意，诺斯替教，期货，食粪学。”

“别夸口了，”格利沙说，“好好喝酒。”

“对了，格利沙，”伊万喝光酒，叹了口气，“我忘得一干二净。听着，有人手里有一大批带萨达姆·侯赛因头像的手纸。是战后剩下的，销路不好。一点都不贵，在你们那儿能卖多少钱？”

“卖倒是能卖不少钱，”格利沙说，“但是，伊万，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干这个利润太小。手纸的市场非常小——只有高级包厢的人才